

曾巩文化丛书

纪念
曾巩诞辰
1000周年

曾布研究

曾布

熊鸣琴
Xiong Mingqin
——著



从曾巩的诗、文、传记、家族、年谱、生平事迹、仕历等方面着手研究，力图全方位展示曾巩的整体形象。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曾巩文化丛书

纪念
曾巩诞辰
1000周年

曾布研究

曾布

熊鸣琴——著
Xiong Mingqin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布研究 / 熊鸣琴著. —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9.6

(曾巩文化丛书)

ISBN 978-7-210-11340-9

I. ①曾… II. ①熊… III. ①曾布(1036-1107) —
人物研究 IV. ①K827=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95431号

曾布研究

ZENGBU YANJIU

熊鸣琴 著

策划编辑: 王一木

责任编辑: 陈子欣

封面设计: 上尚装帧设计

出版发行: 江西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编辑部电话: 0791-88612505

发行部电话: 0791-86898815

邮 编: 330006

网 址: www.jxp-ph.com

E-mail: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55千字

ISBN 978-7-210-11340-9

定 价: 66.00元

赣版权登字—01—2019—19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承 印 厂: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曾巩文化丛书》

编委会

主 任：吴自胜

副主任：乐启文 刘海涛 段云来 邓 军

委 员：伍 珊 颜国清 曾 彪 曾无非

王琦珍 熊鸣琴 罗伽禄 邹自振

夏老长 曾水旺 张文斌 黄小春

李 强 王智勇 张文龙 李月红

陈飞龙 王永明 李秀华 顾建华

黄行福 彭晓华 刘欣欣 徐 敏



曾布研究

熊鸣琴——著

Xiong Mingqin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总序：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

王水照

宋代的江西是文化辉煌、群星璀璨的地区，所谓“两宋文人半江西”。其时人文鼎盛，可与汉唐比肩，给后世留下丰厚的精神遗产，江西的才俊们做出很大的贡献。唐宋八大家，宋占其六，而江西又占宋之半壁。在这些熠熠群星间，曾巩是炫人眼目的存在，用朱熹的评价就是：“公之文高矣，自孟、韩以来，作者之盛未有至于斯。”

曾巩早年求学期间，家庭频遭变故，以致他以单弱之身“经营食众口，四方走遑遑”，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终于进士及第，走上仕途。在馆阁九年，校勘、编定了多种史书。馆阁之后自求外放，转徙七州，政务处理精敏清廉，政声流芳千古。在曾巩的著述生涯中，于文学、理学、史学、金石学等文化领域均有重大的建树，王安石对他的成就推崇备至：“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这是曾巩的生前之名。

从南宋朱熹的崇奉开始，历元、历明、历清，数百年间，他的声望一日高于一日。明初的朱右创《八先生文集》，嗣后就形成了绵延不绝的“八大家”选本系统。到清初被誉为“天下清官第一”的张伯行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此书共选曾巩文章128篇，几等于同书其余宋五大家选文的总和。曾巩的声誉到达顶点，几乎无人可以颉颃。也就是说，在八九百年的时间内，曾巩在文学上的声望是不亚于欧、苏、王的，甚至某些方面、某个时期还受到过特别的褒扬。作为中国文学史两宋期间承上启下的代表性人物，曾巩被誉为“上续孟子，下启濂洛”，也因此，他被视为“千古醇儒”。

后世对曾巩这样的尊奉，可用陈师道的诗来形容：“向来一瓣香，敬为

曾南丰。”这是曾巩的身后之名。

五四狂飙突起，曾巩的历史命运遭遇重大转折。提倡科学、民主，高呼“打倒孔家店”口号的新文化运动，对于素以“醇儒”面世的曾巩，自然处在横扫之列；他的“古文”以说理为主，提供了我国古典散文审美体系中别具一格的类型，但与其时新文学运动提倡文学革命、张扬以抒情性、形象性为核心的西方“纯文学”观念，发生严重冲突，曾巩和其他文学先贤一起，跌落到被冷落、被贬抑的低谷。虽有不同的声音，但甚为微弱。这不仅是对历史人物的不公，更是不利于深刻认识曾巩遗产对于当下社会的精神价值，不利于文化选择的多样性，不利于民族性的坚守。我们不能自弃取径，自毁宝藏。

1983年，江西省在曾巩故里南丰县举办了曾巩逝世900周年的纪念活动。学界重新审视曾巩，对曾巩的文学、史学的存在致以相当隆重的敬意。从此曾巩重新进入现代人的视野，他的文本被重新阅读，重新评价。曾巩自然是经得起重新阅读和重新评价的。

2019年是曾巩诞辰1000周年，江西各地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这是一次盛会，也是一股东风，我们要借此更深入地研究曾巩，拿出更多的成果来，以慰藉这位曾一度备受冷落的大家。曾巩诞辰千年之际，江西省及曾巩故里南丰及早谋划，推出这套《曾巩文化丛书》，一共8册，从曾巩的诗、文、传记、家族、年谱、生平事迹、仕历等方面着手研究，力图全方位展示曾巩整体的完满形象。丛书作者既有省内外曾巩资深研究学者、专家，也有本地新的研究人员，《曾巩文化丛书》墨香浓郁，琳琅满目，深耕细作，推广了曾巩文化，又培养了后继人才，可谓一举数得。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寻两宋江右文化繁荣兴盛的原因，必须以深刻分析研究人物个案为切入点。这套《曾巩文化丛书》便是一次很好的践行，值得细读精研。

是为序。

（王水照，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原会长）

绪论

曾布（1035—1107），字子宣，谥文肃，北宋建昌军南丰（今江西南丰）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之弟，王安石变法的忠实支持者，宋徽宗朝官至宰相。

南丰曾氏是宋代江西最负盛名的衣冠望族之一，其中即以曾巩、曾布、曾肇三兄弟为著，号称“南丰三曾”。曾氏兄弟不仅以文名于当世，在政治上亦颇有建树，曾布更是一度身居“枢密”“宰相”等高官要职，南丰曾氏在此时文化上臻于辉煌，政治上也达到极盛。但随着曾布、曾肇兄弟同入元祐党籍，曾氏的兴盛告一段落。可以说，曾布是南丰曾氏崛起过程中的关键人物，所起作用不在其兄曾巩之下，不仅政治成就居三曾之首，在学术上亦有可书之处，如：曾布有词《水调歌头》七首传世，不仅开金元曲套数先河，而且因其叙事性又开金元杂剧与南戏先河；前人又称其书法之妙不减苏、黄（苏轼、黄庭坚）等等。

曾布在北宋政坛上的影响力更加不容小觑。北宋中后期^①党争的激烈程度为历代罕见。它萌芽于宋仁宗景祐、庆历年间，盛行于宋神宗熙宁以后，历哲、徽、钦三朝，直至北宋灭亡。这场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朋党之争，将北宋君臣均卷入其中，将宋王朝引向衰败之路。置身其中的士大夫，有志在当世的忧患精神，变法图治的宏图伟愿，但最终又因政见相左而分野，陷入党同伐异、无休无止的交争中，演绎出一场时代与个人的双重悲剧。曾布即是陷身党争漩涡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他不仅生活在北宋党争最激烈的时期，且投身其中（主要指王安石变法引发的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不能自己，其政治上的波折和性格中的多面性颇具典型意义，值得宋史研究者去大力探

^① 关于北宋历史分期问题，业师张其凡先生在《两宋历史文化概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一书中将北宋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六十二年，为北宋前期；仁宗、英宗两朝四十五年，为北宋中期；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六十年，为北宋后期。本书从此说。

讨：他既有敢于直言的一面，又有玩弄权术的一面；他积极倡导新法，为旧党所不容，但同时又与新党的某些成员格格不入，互相攻击，势同水火（先后有同吕惠卿、章惇、蔡京之争）；他身为新党，却入元祐党籍，生前已见证了自己政治上的失败，死后更为后人所鄙夷，与蔡京之流同入《宋史·奸臣传》。然而，考察曾布一生的所作所为，却也不至于如《宋史》描绘的那样不堪，他在宋徽宗当政初期首倡建中之政，虽然以失败告终，却曾经给长期陷入朋党之争的北宋政局带来一线生机，生前与之交游者不乏苏轼之类的正直之士，身后宋元以来为其鸣不平者亦大有人在。

作为一个较有争议的人物，曾布已经引起了宋史研究者的兴趣，近年屡屡有专论他的文章发表，但大多是停留在对曾布某一时期的阶段性研究这一层面，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去考察的研究仍属罕见。^①本书主体就是对曾布生平交游、家族姻亲、政治作为、学术成就等作一全面考察，但也无意写成单一的曾布评传，重点是将曾布与特定的时代背景相结合，探析在党争的特殊背景下，特定人物（在本书即是曾布）的政治心态、交游及学术取向，以及这种心态和取向反过来对时局产生的影响，以期达到从时代看个人，从个人看时代的双重效果。

^① 对曾布的考察尚无学术专著问世，笔者所见相关学术论文有：刘子健《王安石曾布与北宋晚期官僚的类型》（载台湾《宋史研究集》[第三辑]，台北中华书局1966年版），此文搜集了大量其他史料，对《宋史·曾布传》的内容作了修正和补充，并以曾布为个案，深入地探讨了北宋晚期官僚的类型，从中对曾布作了一个新的评价，是现有研究曾布的最全面的一篇文章。但不够深入，对曾布同党争的关系也未展开论述。俞兆鹏《论所谓曾布“反对市易法”的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4期）、李涵《从曾布根究市易违法案的纷争看新党内部的矛盾与问题》（载邓广铭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二文详细地分析和探讨了曾布“反对市易法”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及性质。裴汝诚、顾宏义《宋哲宗亲政时期的曾布》（载漆侠、王天顺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此文对曾布在哲宗亲政时期的所作所为作了评述，认为他是一个政治品质不良而又善于权术的宰执。张邦炜《关于建中之政》（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一文以徽宗建中之政为切入点，对曾布在徽宗初期为相时的作为进行了分析和讨论。罗家祥《向后垂帘与“建中初政”》（载张其凡主编《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十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曾布与北宋哲宗、徽宗统治时期的政局演变》（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汪天顺《章惇与曾布、蔡卞交恶及其对绍述政治的影响》（载《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三文分析了曾布在绍圣、元符及建中靖国时期的政治行为及其对当时政治格局产生的重大影响。此外，笔者在暨南大学古籍所攻读硕士学位时，曾撰写学位论文《曾布与北宋后期党争》（暨南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主要侧重曾布的政治生活层面，本书在前者的基础上，不仅利用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修正了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且扩大了视角，内容涉及曾布其人其事各个方面。

绪论····· 001

| 第一章 |

曾氏家族与曾布生活的时代

第一节 变革与党争：曾布生活的北宋中后期
时代特征 ····· 001

第二节 曾布的家族与姻亲····· 009

| 第二章 |

初涉党争：曾布生平仕宦与熙宁变法中的起落

第一节 曾布的生平仕宦····· 032

第二节 投身新法阵营····· 039

第三节 与吕惠卿之争：根究市易务违法案
····· 046

| 第三章 |

策位枢府：赞助“绍述”与曾布章惇蔡卞之争

- 第一节 “毅然中立”：曾布与哲宗朝的党派之争
..... 061
- 第二节 曾布与“绍述”及对外开边事宜..... 081
-

| 第四章 |

“龟鹤宰相”：曾布与宋徽宗初立政局

- 第一节 徽宗策立与建中靖国格局的奠定..... 094
- 第二节 入元祐党籍：建中之政的失败与曾布的政治结局 105
-

| 第五章 |

书香传家：南丰家学与曾布的文苑风采

- 第一节 曾布与南丰家学..... 121
- 第二节 曾布的文苑风采..... 130
-

| 第六章 |

曾布交游考

- 第一节 同年之交：曾布与苏轼..... 159
- 第二节 朋僚门人之交..... 165
- 第三节 崇信佛教与曾布的方外之交..... 175
-

| 第七章 |

身后是非：子孙后裔与曾布“奸臣论”辨析

第一节 子孙姻亲与曾布的身后是非	185
第二节 从曾布看北宋后期党争	204
第三节 所谓的“曾布奸臣论”	215

征引和参考文献	220
附录一 曾布家族北宋世系表	233
附录二 曾布简明年表	234
附录三 《云阳曾氏十四修家乘》之《文肃家传》	245
附录四 《曾巩诸妹婿名实考辨》	257
附录五 《〈全宋诗〉曾布诗订补》	266
后 记	274

第一章

曾氏家族与曾布生活的时代

第一节 变革与党争：曾布生活的北宋中后期时代特征

曾布生活的时代恰值北宋中后期，这是一个集多种矛盾于一身的时代。一方面是社会经济文化较之前代有了长足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危机感在士大夫中日益蔓延，“庆历新政”“熙丰变法”相继而起，意图进行变革，但却由此引发了北宋政坛激烈的党争。在无休止的党争中，新政和变法都归于失败，却致使北宋前中期运作良好的政治文化逐渐遭受破坏。公元 1127 年，在党争的余波中，金军南下，北宋王朝宣告灭亡。

一、积贫积弱乎：北宋前中期历史面貌的新认识

宋朝是经过唐末五代的社会大动乱之后建立的，疆域较之汉唐小了不少，并未实现真正的大一统，与之先后并立的政权有辽、西夏、金、蒙元等，给宋朝统治造成很大困扰。或许正因为此，在很多教科书中，宋朝给人的印象就是“积贫积弱”。钱穆先生便认为北宋初立即已陷入贫弱，在《国史大纲》第六编“两宋之部”中，他使用了“贫弱的新中央北宋初期”之类的标题，且在“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中说：“宋代对外既如此不振，而内部又终年闹穷。而且愈闹愈凶，几于穷得不可支持。”在此基础上，钱穆先生进一步

指出，正是这种危机激发了士大夫变革求新的“自觉精神”。^①

近年来，关于宋朝“积贫积弱”的认识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②学者们普遍意识到，宋朝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其经济较之唐代有显著增长。如，宋朝疆域虽比唐小，但它的开垦面积(511万顷)高于唐(485万顷)，一说唐代337万顷，宋代472万顷；就单位面积产量而言，宋也高于唐，唐代富饶的关中地区亩产稻谷二石，而宋代许多地区亩产米已达到二至三石，并在较大范围内实现了稻麦两熟制。唐玄宗天宝年间，铜钱产量为32.7万贯，北宋一般年产量则为100万至300万贯，最高纪录为506万贯。至于“积弱”，说宋朝军事“落后”也是不准确的。在军事技术上，古代黑火药的应用主要是在宋朝。战争具有进攻和防御两个战略方面，宋朝在防御战上具有相当强的作战能力，与辽、金对峙，进攻之力不足，防守则有余；和西夏比，实力还略强一些；而对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军而论，最顽强的抵抗对手就是南宋。

与之相应，宋朝政府的中央财政收入也高于唐朝，至庆历新政前夕已超过了唐朝的四倍，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国初至绍熙天下岁收数》载：“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笔者注：宋真宗统治后期年号)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③但北宋中央财政支出亦颇大，素有“三冗”之说，熙宁二年(1069)，大臣苏辙在上书总结以往弊政时，将之概括为“冗吏、冗兵、冗费”。^④其中以冗兵费用最为突出，治平三年(1066)，处理财政事务的三司使蔡襄上《论兵十事疏》，对当时的军费开支和财政岁入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计算和对勘，并

①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23、527、558页。

② 以下相关论述参见赵永红《北宋“积贫”问题初探》，《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邓小南《宋代历史再认识》，《河北学刊》，2007年第5期；王曾瑜《正确评价宋朝的历史地位》，《北京日报》，2007年12月10日第019版；李裕民《破除偏见，还宋代历史以本来面目》，《求是学刊》，2009年第5期；李华瑞《宋朝“积弱”说再认识》，《文史哲》，2013年第6期。

③ [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国初至绍熙天下岁收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89页。

④ [宋]苏辙撰，曾枣庄、马德富点校：《栾城集》卷21《上皇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页。

得出结论：“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国用几无矣。”^①不过，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北宋财政大致能够达到收支平衡。赵永红先生曾归纳了北宋前中期真、仁、英三朝的几个财政收支数字，列表如下：^②

项目 年号	总收入	总支出	余(歉)	史料来源
天禧末	150850100	126775200	24074900	《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
庆历八年	103596400	89383700	14212700	《长编》卷一六七
皇祐元年	126251964	而所出无余		《长编》卷一七二
治平元年	101905764	100399449	1506315	《蔡忠惠公文集》卷一八《论兵十疏》
治平二年	116138405	120343174 其他 11521278	歉 15726047	《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

上表显示，从真宗天禧末到英宗治平元年（1064）的几个时间点里，北宋国家财政结余都在一百万以上，只有治平二年（1065）出现了财政赤字，好像是财政困竭了。但据《宋史》卷179《食货志》“治平二年条”记载：“是岁诸路积一亿六千【零】二十九万二千【零】九十三，而京师不预焉。”这一年户部赤字一千五百多万，地方却积储了一亿六千多万。单看中央的情况是入不敷出，但加上地方财政收入，则还是收入大于支出。也就是说，庆历新政前后的仁宗时期，北宋财政收入一直大于支出；至王安石变法前夕的英宗治平年间，中央财政出了一点问题，但民间和地方财政还是比较好的。李裕民先生认为，王安石变法时期生产工具、生产关系并没有本质变化，但王安石一实行变法，财政赤字马上得到解决，正是因为有雄厚的民间和地方财力做支撑，说得简单些，变法主要是将民间和地方财政上的一部分钱装进了中央政府的腰包里。^③

至于说北宋因为要付给契丹岁币而导致财政紧张，那更不是事实。宋廷每岁所输之币虽多，但通过榷场互市，完全能够弥补回来。仅河北边境，宋辽榷场贸易的总值就逼近一百五十万贯，宋每年可以从中获得四十余万的利

① [宋]蔡襄：《蔡忠惠公文集》卷18《论兵十事疏》，《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清雍正甲寅刻本。

② 见赵永红《北宋“积贫”问题初探》，《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

③ 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润。^①宋徽宗朝大臣宋昭表示：“臣窃料议者谓岁赐浩瀚，虚蠹国用，是不知祖宗建立榷场之本意也。盖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也。”^②

然而，北宋大臣奏章中又确实屡屡透露出对国家财政的忧虑。于此，程民生先生《论北宋财政的特点与积贫的假象》一文给予了解释，指出北宋存在四大财政系统：计司系统、朝廷系统、内库系统、地方系统，各个部门之间缺乏统一规制，还存在财政上隐瞒的问题，导致各部门在向皇帝上章报告时，大都认为财政收支不平衡，给人以国库空虚的错觉。^③

基于以上新认识，有必要重新检讨一下范仲淹改革与王安石变法的背景。传统观点认为，两次革新都与北宋中期严重的社会危机有关。李裕民先生在《范仲淹变法新论》^④一文中进行了全面驳斥。首先，前已揭示，北宋并不存在严重的财政危机。其次，政治上，宋朝在太宗之后皇权是相当稳定的，虽然存在一些吏治问题，但还没有严重到危机的程度。再次，军事上，澶渊之盟后，宋辽关系比较稳定，仁宗时期西夏多次与宋交战。就宋夏双方兵力而言，西夏骑兵较强，机动性强，进攻力强；宋方兵多，防御能力较强。在阵地战、运动战中西夏处于优势，在城寨的攻守战中，西夏不能占到多少便宜。如果相持下去，双方的优势与劣势就会转化。宋夏庆历和议之后，双方军事局面逐渐向有利于宋方转化，到哲、徽时期，西夏已处于劣势。最后，很多学者都论及北宋中期农民起义频繁、阶级矛盾激化的问题，这在宋人奏章中也有反映。如，庆历三年（1043），欧阳修向仁宗上奏盗贼横行的问题，云：“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⑤但仔细检视，这些盗贼的规模都不大：“今建昌军一火四百人，桂阳监一火七十人，草贼一火百人”，^⑥政府一出兵，

① 参见张亮采《宋辽间的榷场贸易》，载《辽金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页。

②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8，宣和四年六月三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许涵度刻本，2008年版，第53页。

③ 程民生：《论北宋财政的特点与积贫的假象》，《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

④ 载氏著：《宋史考论》，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7页。

⑤ [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00《再论置兵御贼札子》，四部丛刊本。

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142，仁宗庆历三年八月辛亥条，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年版，第3419页。

很快就能平定。治平四年(1067),司马光曾上书,称当时“灾异屡降,饥馑荐臻。官多而用寡,兵众而不精。冗费日滋,公私困竭。戎狄桀骜,边鄙无备。百姓流亡,盗贼将起”,^①活脱脱一幅公私交困、内外皆危的惨景。这也是有些夸大其词的。宋人为了强调变革的重要性,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往往将问题说得比实际情况严重得多。

从实际情况来看,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后,社会仍在往前发展,出现了仁宗后期“嘉祐之治”的黄金局面;王安石熙宁变法中止了,北宋后期的经济也没有垮台。当时社会肯定存在吏治腐败、中央财政吃紧、因循守旧等一系列问题,但远没有到病入膏肓的地步。在这种背景下,该如何去认识北宋中期“通变救弊”思潮的高涨呢?

二、“通变救弊”思潮的高涨与党争的兴起

北宋中期,“通变救弊”代表了一种不可遏止的时代潮流。李觏大声疾呼:“今之事,可谓急矣。”“弱甚矣,忧至矣,非立大奇,不足以救!”^②作为庆历新政的领袖人物,范仲淹尖锐地指出:“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穷塞,则思变通之道。既能变通,则成长久之业。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③此后,王安石在《上神宗皇帝万言书》中也鲜明地表达了更新天下的主张。而许多后来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物在当时都同样怀有“通变救弊”的渴望,如嘉祐六年(1061),司马光在《论财利疏》中严厉抨击了朝廷的种种弊政,认为“凡所数事,皆以竭民财者,陛下安得熟视而无所变更耶”?^④治平四年(1067),他又上《衙前札子》,论差役之害,认为“若因循不改,日益久,则患愈深矣”。^⑤南宋朱熹指出:“熙宁更法,亦是势当如此”,“只当是时非独荆公要如此,诸贤

① [宋]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36《乞罢详定押班札子》,四部丛刊本。

② [宋]李觏撰,王国轩点校:《李觏集》卷28《寄上孙安抚书》,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9、313页。

③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四部丛刊本。

④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23《论财利疏》。

⑤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38《衙前札子》。